

北京大学东北亚史研究丛书

(韩) 李元烨 著

中美两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演进历程研究

——从对抗走向协调 (1945—2000)

**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Policies
towards Korean Peninsula**

— *From Antagonism to Cooperation (from 1945 to 2000)*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HONG KONG PRESS FOR SOCIAL SCIENCES LTD.

北京大学东北亚史研究丛书

中美两国的朝鲜半岛政策 演进历程研究

——从对抗走向协调

(1945 - 2000)

李元烨 著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3 年 10 月

中美两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演进历程研究

作 者 / 李元烨

责任编辑 / 金 文

封面设计 / 雍 华

发 行 人 / 韩方明

出 版 者 /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金钟道89号力宝中心第2座2006室

电话:852-2526 5338

传真:852-2536 9223

电邮:hkpress@dragoncom.com

排 版 / 龙浩国际交流出版公司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 龙浩中国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3年10月香港初版第一次印刷

I S B N / 962-620-071-5

定 价 / 港币3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Hong Kong

北京大学东北亚史研究丛书

总 序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随着中日韩三国先后于 20 世纪 60、70、80 年代掀起三次经济开发热潮,从总体上提升了东北亚的国际竞争力和地位。国际资本不请自来,东北亚再次成为国际经济社会满怀希望的黄金之乡。随着世纪之交朝鲜半岛核危机的接连发生,“台独”势力的玩火嚣张,东北亚地区集体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随着美国战略东移、日本加快军事大国化的步伐和三八线南北和海峡两岸统一进程中突变因素的增加,解决东北亚地区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越来越急切。随着中美日俄四大国纵横捭阖于东北亚国际舞台,使之成为大国利益与较量的台风眼,东北亚地区外交活动中的全球色彩日趋强烈。总之,在上述经济开发的利益要求、集体安全的现实考虑、国际政治的运作规则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着东北亚。相关国家纷纷建立官产学三位一体的协作体制,投入大量的经费、精力与智慧,竞相开展战略、政略性的东北亚研究。逐年兴旺发展的东北亚学,成了国际学术的前沿园地和一门显学。

然而,在东北亚的现有研究中,受制于经济首位、应用优先等现实需要,乍看起来五花八门的研究成果虽然数量惊人,但缺乏应有的深度、学术分量和持久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不够重视对东北亚历史演进历程的应有研究。

众所周知,主要由中日韩三国构成的东北亚古代世界,曾经创造了可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类型相媲美的灿烂东亚文明,为人类的开化和进步做出过应有的贡献。在近代世界,日中韩三国分别提供了帝国主义、半殖民地化和殖民地化等整个东方世界所有的近代化发展类型,其典型性、密集性和独特性超过了世界上的其他区域。在现代世界,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再崛起,与全球化浪潮之下,世界区域化普遍开展而唯独东北亚的经济区域化举步维艰一样,令人始料不及,也令人研究的兴趣盎然。如果从历史进程的连续性和变异性的视角出发,将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东北亚各断代史连通起来思考,不难发现其发展进程独特性与普遍性的秘密所在。在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上,可以说正是由于东北亚古代博大精深的文明形成了自我更新和发展的根基,并在近代历经了痛苦的裂变与不断的选择,积蓄了强大的反弹力量,从而为现代的历史跃进与重新崛起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同样,现代东北亚区域化的阻滞因素,也可以在近代东北亚历史进程中找到直接答案,并在古代东北亚历史进程中探询、剖析其源头。换言之,古、近、现代三代的历史进程相互关联,前后承递,在历史的长河中蕴育了东北亚的地区发展的能量和特质,无论是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在这方面,国内外的研究者已经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例如,为了找到解释东北亚经济奇迹的钥匙,学者们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文化传统、精神特质、思维方式、民族性格、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与文化精神有关的因素得到了最大可能的诠释和发掘,为文化热的持续升温投放着燃料。毋庸赘言,这些研究已涉及历史文化的某些侧面,也不乏真知灼见和开拓意义。但是,对东北亚历史进程的研究仍处于零散而非全面、实用而非学术、表面而非深入的状态。迄

今为止,甚至还没有一本东北亚的通史或者断代史的学术专著出版。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人们对东北亚发展全过程的认识和理解。

有鉴于此,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力图在目前东北亚研究相对薄弱的领域有所贡献。具体说来,就是在近期内陆续出版有关东北亚历史的研究成果,并使之成为研究系列。有关重大选题的历史专题研究,是形成研究系列的第一步。这些研究课题,主要涉及东北亚历史研究的导论、古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古代东北亚社会经济、古代东北亚的国家关系与民族关系、古代东北亚的文化交流与区域文化类型的发展、近代欧亚互动及其影响、近代中日韩三国近代化发展类型的比较、近代东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近代东北亚的民族民主运动、现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全球化与东北亚的经济区域化、东北亚经济开发与合作、东北亚集体安全与区域化的模式研讨、当代东北亚国际格局与经济发展中的美国因素、中日韩三国关系、中美俄日四大国关系研究等。在此基础上,即经必要积累后,推出有关东北亚断代史、通史研究的成果,力所能及地为国际东北亚研究添砖加瓦,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为北大东北亚研究的总体理论构思,力图在不同的研究课题中运用当今国际学术界的各种有价值的研究理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与此同时,也要提出有自身研究特色的理论框架。例如,“中日韩三国三足鼎立论”就是其中的一个。这种理论参照了国际关系学中的势力均衡论,并根据对古代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发展过程的考察,认为:经过 2000 余年的漫长历史演变过程,从 7 世纪中后期开始,在东北亚就形成了中日韩三国并立共存的三足鼎立关系架构。三足并立均衡,特别是朝鲜半岛的一足稳定强劲,并得到中国大陆、日本列岛政权的尊重与承认,则东北亚大局稳定,和平友好、兴旺发展、文化繁荣的局面自然得到维护和延续,使三国人民同享四海一家的太平之福。否则,必带来大陆与列岛力量的

碰撞、冲突,出现战争破坏和平、杀戮取代友好、经济疲惫、文化交流受挫的令人扼腕的悲惨情景。与此同时,还将留下世代难以遗忘的历史创伤,使后世为前世的历史罪孽不停地付出精神或心理上的沉重代价。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历史经验教训很不幸地在近代再次以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惨痛方式重演,并留下至今仍在记忆中鲜血淋漓的仇恨和创伤!所有的一切归结为一点,就在于朝鲜半岛的一足因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而受到重创乃至消亡。至于其他的有中国学术特色的研究理论,尚有待继续研究并提出。

学术乃天下公器,东北亚是我们大家的共同的家园。因此,东北亚研究需要有关国家的学者们共同努力,在同求学术真谛的过程中,推进东北亚研究的发展。作为本系列研究的选编宗旨之一,除了选编并出版中国学者的研究专著之外,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研究者的成果也在其中。特别是对于涉足学术园地的青年学者来说,东北亚史系列研究更应该为他们创造成长发展的条件,助一臂之力。因此,在本系列研究丛中,将选取有分量的北大历史学系的博士学位论文,予以修改和出版。

展望 21 世纪的东北亚,挑战与机遇并存,和平与战争相互转换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同在。如何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新世纪新的东北亚和平、发展与合作找到新的思路,是各国学者面临的共同课题。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的研究者们肩负着重大责任和义务。出版东北亚史研究系列成果,就是责任和义务的具体体现。

是为序。

宋成有

2003 年 8 月 8 日

于汉城安岩洞开运山

“所有民族都具有自治能力和权力,但殖民地的人民需要长期的准备时间”,强调了对殖民地实施委任统治的必要性。^① 罗斯福也基于这一点,认为对实施托管地区的居民进行一段时间的培训,培养其自治能力尤为重要。他确信通过托管可以使殖民地人民享受文明的好处,保护其免受列强的剥削,享受正常人的生活,增进当地经济的、社会的正义。^② 但在构思托管方案时,他并没有忘却谋求美国利益这一重要的事实。他认为托管不仅有利于殖民地人民,而且也能为美国在战后充当国际警察提供充足理由,在贸易上可促进更为自由的商品流通并可控制产自实施托管地区的原料。^③ 美国国务院甚至主张托管的重点为谋求经济利益,而培养殖民地人民的自治能力是次要的。^④ 可见,托管方案的根底有美国式的逻辑,即具有其人道主义精神和美国式帝国主义逻辑的双重性质。罗斯福主张殖民地托管的另一理由,是美国在菲律宾取得的经验。在1942年11月15日的演说中,他主张菲律宾的事例应成为其他殖民地的样板,强调殖民地人民需要普及教育和改变物质、社会、经济贫困的准备时间以及旨在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接受自治训练

① Arthur Link, “Wilson the Diplomatist,” in Armin Rappaport (ed.), *Essays in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67, pp. 206 - 209.

② “International Trusteeship”, December 8, 1942, PI23 - b, P - 1. O. 29h, TI69 - a, Records of Harley A. Notter, 1939 - 45,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hereafter Notter File, Records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Post - War Foreign Policy, Record Group, hereafter RG 59, Box 63, Lot 60D - 224, National Archives (hereafter NA), p. 1; William G. Morris, op. cit. p. 39, footnote 4.

③ “Meeting of Division of Special Research,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8, 1972, P Minutes 21, Notter File, Records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Post War Foreign Policy, RG59, Box55, Lot 60D - 224, NA, p. 6; Willard Range, *Franklin D. Roosevelt's World Order*,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59, pp. 109 - 114.

④ Ibid., Notter File, p. 9.

的时间。^①

基于以上考虑,1942年2月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研究局的兰德(William R. Langdon)认为:“朝鲜半岛人民中大部分为文盲,^②在政治上不成熟,在经济上贫穷、落后,因此,至少需要在一代人的期间内受到大国的保护和支配,助其逐渐获得近代国家的地位。”^③同年8月,美国国务院经过讨论,认为“解放后朝鲜半岛能否立即独自处理自己的问题值得怀疑,朝鲜半岛应经过国际援助或监护。”^④

此外,美国国务院对当时在海外开展韩国独立运动的团体有不好的印象,也成为实施托管的一个原因。1942年4月,中国曾向美国提议立即承认当时在重庆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⑤但美国政府坚决反对,其理由是韩国独立运动团体之间缺乏统一性,与本国大众没有联系。^⑥

① Samuel Rosenman (ed.),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1942,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2, pp. 473-476; Carl Berger, *The Korean Knot: A Military - Political Histo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7), p. 36.

② “Conditions in Korea”, July 6, 1945, From Paul Gore - Booth, Esq., Washington Embassy to Professor Toynbee, Foreign Office, hereafter FO, 371/46471, X/P4502, Registry Number F 4371/1653/23.

③ “William R. Langdon Memorandum”, February 20, 1942,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895.01/79, in James I. Matray, *The Reluctant Crusad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Korea, 1941 - 195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pp. 8-9.

④ “Far Eastern Problems”, Meeting of August 1, 1942, P Minutes 20, Notter File, Records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Post War Foreign Policy, RG 59, Box 55, Lot 60D - 224, NA, p. 2.

⑤ “T. V. Soong to Roosevelt”, April 8, 1942,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General: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 The Far East, 1942, vol. 1,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2, pp. 868-869.

⑥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May 1, 1942, *ibid.*, pp. 863-874; “To Ammisco, Chung - king China from Marshall”, August 15, 1942, War Department No. 1201, G - 2, Operations Division, RG218, NA.

此外,1943年8月美海军部专家的评价报告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为了争夺地位互相怀有阴谋的,充满不满情绪的失业者集团”,认为旅美的独立运动家李承晚与韩吉洙的关系如同“水与火”,严重分裂。^①

美国政府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印象对其政策的方向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②在美国看来,独立运动团体四分五裂,独立后,这些团体能否互相协作、建设国家,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托管时期进行训练以使其具有自治能力是十分必要的。

美国政府还认为,由于在东北亚所处的战略地位,朝鲜半岛问题与大国的政治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③参议员摩尔斯(Wayne L. Morse)曾说“不管亚洲的未来将如何,朝鲜半岛将发挥重要的战略性作用”,^④指出朝鲜半岛作为亚洲大陆的战略基地所具有的重要性。^⑤1943年11月“国务院领土委员会”制定的文件说“北太平洋的安全是美国关心的问题,朝鲜半岛的政治发展可能对该地区的安全产生影响,因此朝鲜半岛在美国关心的范围之内。”^⑥美国非常担心对朝鲜半岛有传统利害关系的中国或苏联在战后支配朝鲜半岛。

美国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蒋介石为恢复中国在东亚的传统地位,在利用与美国的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支援当时在重庆的大

① “Analysis of the Korean Situation”, August 13, 1943, RG 353, NA, in Michael C. Sandusky, *America's Parallel*, Alexandria: Old Dominion Press, 1983, p. 90.

② Donald C. Hellmann, “The American Perception of Korea: 1945-1982,” *ibid.*, p. 78.

③ George M. McCune, “Korea: The First Year of Liberation,” *Pacific Affairs*, vol. XX, Dec. /1947, p. 3.

④ Oswald G. Villard, “We Must Free Korea Now,” *Asia and the Americans*, vol. XLV, no. 11, Nov. 1945, p. 520.

⑤ Shannon McCune, “The Thirty-Eighth Parallel in Korea,” *World Politics*, vol. 1, no. 2, Jan. /1949, p. 224.

⑥ “Japan: Korea: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Trusteeship: Membership of the Council”, 30 Nov. 1943, H-107 Preliminary, Notter File, RG 59, Box 59, NA.

韩民国临时政府。^① 蒋介石支援临时政府的另一理由,是为了防止在西伯利亚接受苏联援助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掌握朝鲜半岛的主导权。他很清楚当时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在财政上、精神上支持朝鲜抗日游击队,而且认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之后为了控制朝鲜半岛战后发展,会利用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的朝鲜抗日武装。如果是这样,中国在战后的朝鲜半岛将失去有利的地位,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也只能支持临时政府。^② 这是蒋介石在战后想把朝鲜半岛置于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的政治打算。实际上,苏联在亚洲大陆的领土上有大约 20 万名朝侨,^③其中约两个师团规模的朝侨军队与红军一同受训。为了在战后的朝鲜半岛建立亲苏体制,苏联很有可能利用这些人。^④ 此外,如果中国被苏联夺去在朝鲜半岛设立军事基地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承认苏联对朝鲜半岛的优势地位,进而导致苏联势力南下朝鲜半岛东海岸的结果,因此有必要防患于未然。^⑤

从苏联的立场来看,朝鲜半岛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其远东港口海参崴离朝鲜半岛边境只有 70 英里,^⑥朝鲜半岛与日本对马海峡上的岛屿共同形成能够封锁或保障苏联进入太平洋的网络,^⑦支配朝鲜半岛至关重要。而且,在朝鲜半岛可以找到苏联的不冻

① Charles M. Dobbs, *The Unwanted Symbol: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Cold War and Korea, 1945-1950*, Kent: The Kent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3.

② "Gause to Hull", April 18, 1942, FRUS, 1942, vol. I, pp. 872-873.

③ David J. Dallin, *Soviet Russia and the Far Ea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255.

④ "Utilization of Koreans in the War Effort", 23 April 1945, State - War - 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115, RG 218, NA.

⑤ "Korea: Security Problems; Strategic Bases", Nov. 13, 1944, H-201 Preliminary, Notter File, Records of Policy and Planning Committee, RG 59, Box 117, Lot 60D-224, NA, p. 2.

⑥ David J. Dallin, op. cit., p. 258.

⑦ John L. Snell (ed.), *The Meaning of Yalta: Big Three Diplomacy and the New Balance of Power*,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27-128.

港口。从历史上看,1905年由于在日俄战争中败北退出朝鲜半岛之前,俄国一直与日本分享朝鲜半岛的自然资源、粮食以及劳动力等。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苏联十分关注朝鲜半岛局势。^①

由上述事实来看,战后中国和苏联必将在朝鲜半岛展开竞争,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这种竞争将更加尖锐。^② 1943年10月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负责人霍恩巴克(Stanley K. Hornbeck)向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提交的报告中也论及中苏在战后朝鲜半岛展开竞争的可能性很大。^③ 面对这种局势,罗斯福政府有必要将在战后围绕朝鲜半岛出现政治摩擦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国和苏联的愿望的前提下确定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作为其对策,罗斯福政府选择了托管方案。因此,可以认为罗斯福政府的托管方案出自尽量抑制某一国对朝鲜半岛的支配的同时,为尽量扩大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打基础的考虑。罗斯福政府认为有必要正式向盟国提出该方案,取得它们的同意。1943年3月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为了就战后问题与美国进行协商而访问华盛顿时,罗斯福首次提出托管方案。在会谈中,罗斯福提议“对印度支那实施托管,满洲和台湾返还中国,对朝鲜半岛实施由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一两个国家参与的国际托管”。^④ 艾登对罗斯福的提议不太满意,他认为参与托管的国家之间的国家利益各不相同,托管难以实施。^⑤

① Leon Gordenker,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Peaceful Unification of Korea: The Politics of Field Operations, 1947 - 195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59, p. 3.

② Tyler Dennett, "In Due Course," *Far Eastern Survey*, vol. XIV, no. 1, Jan. 17, 1945, p. 2.

③ "Hornbeck to Hull", October 4, 1943, Real 24, Folder 160, Box 52 - 53. Hull papers, in James I. Matray, op. cit., p. 19.

④ 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vol. II,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8, pp. 1595 - 1596.

⑤ Ibid., p. 1597; Robert 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8, pp. 865 - 866.

围绕托管方案,美英两国意见分歧。英国认为托管只是美国夺取殖民地的一种策略,一旦适用于所有殖民地,将会招致英国被迫放弃对其殖民地的既得权的结果。^①为了防患于未然,英国只能固守其对殖民地的原有立场,即它希望自己的殖民地在战后应在其框架之内实施自治。^②英国希望基于上述基本立场来处理包括朝鲜半岛问题在内的战后殖民地问题。英国在远东的利害关系主要在北回归线(北纬 23.5 度)以南地区,朝鲜半岛并不是英国的关心对象,^③但由于朝鲜半岛是日本的殖民地,因此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方案,英国的反应颇为敏感。与此相反,在战争中逐渐成为新的头号世界大国的美国希望在战后实施托管方案,以便对殖民地施加影响力。罗斯福想要通过反殖民主义政策削弱英国等欧洲殖民帝国的力量,^④同时欲将在将来由联合国支配的世界所有地区作为其战略基地,置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⑤罗斯福的这种计划不可避免地与英国的立场发生冲突。在打败共同的敌人时美英两国相互合作,但在维护本国利益的问题上,彼此都坚决不肯做出让步。这样,就需要在盟国国际会议中协商解决问题。

(一) 开罗会议

盟国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第一次多边讨论是在开罗会议上。开罗会议也是二战期间,同盟国十几次最高级会议中唯一有中国参加的一次。1943 年 11 月 22 日至 26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中国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议,讨论了

① “Churchill to Eden”, December 31, 1944, Prime Ministers, Papers, PREM 4 31/4,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in Akira Iriye, op. cit., p. 87.

② William G. Morris, op. cit., p. 70.

③ “Future of Korea”, July 24 1945, From Mr. Foulds to Mr. Sterndale Bennett, FO 371/46468, X/P 05596, Registry Number F 4702/1394/23.

④ William R. Louis, Imperialism at Bay, 1941 - 1947: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colonization at the British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47 - 148.

⑤ William D. Leahy, I Was There, New York: 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Inc., 1950, p. 314.

与中国和亚洲有关的重大军事、政治问题,包括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和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会后发表了三国签署的“开罗宣言”。

开罗会议的第二天晚上,罗斯福与蒋介石就广泛的政治问题进行会谈。关于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和泰国等,罗斯福提出,中美应就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和其他殖民地,以及泰国的未来地位达成一项相互谅解。蒋介石表示同意,并强调了给予朝鲜半岛独立的必要性。^① 这是因为他要在反映中国军民期盼朝鲜半岛早日独立的要求中,树立积极支援朝鲜半岛独立的领导人的形象以及为了在将来确保中国对朝鲜半岛政府的影响力。但罗斯福似乎看破了蒋介石的意图,不愿意中苏之中的任何一国支配朝鲜半岛,因此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事务性会谈中,英方只主张空泛地写入“使朝鲜脱离日本之统治”而不提独立问题。中方代表王宠惠强调“朝鲜原由日本侵略吞并,而日本之大陆政策即由吞并朝鲜而开始”,不明确写入独立,必“为将来留一重大问题,殊非得计。”坚决主张在宣言中决定朝鲜“自由独立之地位”。后经美方代表哈里曼协调,终于形成宣言的正式文字。^②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了《开罗宣言》。有关朝鲜部分是宣布,“我三大国轸念朝鲜半岛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内,使朝鲜半岛自由独立”。^③ 三大国承认朝鲜民族独立斗争,是开罗会议的一项积极贡献。宣言所说的“在相当期间内”(in due course)包含了托管方针。美方霍普金斯起先表述为“尽可能早的期间内”获得独立,丘吉尔修改为“在相当期间内”。^④ 这种对文句的修改源于美英两国欲以明文的形式委婉地

① FRUS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以下简称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 pp. 325.

② 大溪档案:《王宠惠纪事》,民国32年11月25日,第35页。

③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In Quest of Peace and Security: Selected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1 - 1951*,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s, 1951, p. 25.

④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 pp. 401 - 404.

表达各自的立场,即丘吉尔要表明英国反对殖民地立即获得独立的立场,而罗斯福则主张战后应对朝鲜半岛实施托管。罗斯福最后同意丘吉尔的修定案是因为他认为这一句也充分反映了自己的意愿。这表明,美国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朝鲜半岛,而它自己又不愿在半岛承担过多的责任以至投入过多的力量,于是以延缓朝鲜半岛独立为代价实行国际托管,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德黑兰会议

开罗会谈结束后,为了协调盟国对轴心国的作战行动及战后世界安排,罗斯福和丘吉尔前往德黑兰。在三方会谈中,罗斯福将开罗会议会谈结果通报给未出度此次会谈的斯大林并取得其同意,丘吉尔问斯大林是否读过《开罗宣言》,斯大林回答:“完全支持宣言的内容,尤其认为使朝鲜半岛独立是正确的。”^①罗斯福在与斯大林的正式会谈中提到朝鲜半岛托管问题,提出“朝鲜半岛人民尚未作好成立和维持独立政府的准备,有必要对其进行40年的培训,”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②

斯大林出于何种意图同意罗斯福的提议尚不得而知,可能是他认为对朝鲜半岛实施托管能够保障苏联在朝鲜半岛的利益。斯大林希望远东邻国朝鲜半岛在战后不要成为敌对国,并希望恢复在日俄战争后被日本夺去的其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因此认为通过托管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或许斯大林从罗斯福的托管方案中看

①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 p. 566; Herbert Feis, Churchill - Roosevelt - Stalin: 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54.

②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 p. 566; Herbert Feis, Churchill - Roosevelt - Stalin: 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869.

出美国默许保障苏联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这一点^①而表示同意。

苏联远东军事计划的轮廓首次出现于1944年10月14日至1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美英苏三大国军事会谈中。此次会谈是由丘吉尔访苏促成,美国总统罗斯福没有出席,由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和美驻莫斯科军事使节团团长迪安(John. R. Deane)将军代为出席。在10月15日的会谈中,斯大林说有可能在德国战败后2-3个月内实施对日攻击,使其在德黑兰会谈中提出的参加对日作战的意向^②更加具体化。^③

10月17日美苏两国间的会谈中,就在朝鲜半岛的作战问题展开重要的讨论。会谈中,斯大林向哈里曼提问美联合参谋部是否考虑在远东与苏军展开协同作战。哈里曼回答说“没有制定这种计划,只考虑到苏军在满洲展开军事作战一事。”对此,斯大林说“为了打败日军,不能将我们局限于满洲地区,应联系各个方面对满洲实施包围攻击。”他主张“必须加强所有海上作战态势,朝鲜半岛北部的港口应由苏军占领”,并希望“美海军停留在东海”。^④

由此可知,如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其作战领域不会局限于中国东北地区,将扩大到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斯大林向美方明确表

①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 p. 566; Herbert Feis, Churchill - Roosevelt - Stalin: 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57.

② Robert E. Sherwood, op. cit., p. 343; John R. Deane, The Strange Alliar“ The Story of our Efforts at Wartime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47, p. 41.

③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Harriman) to the President”, Moscow, October 15, 1944,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p. 368 - 369; John R. Deane, The Strange Alliance, pp. 244 - 249; John L. Snell (ed.), op. cit., pp. 134 - 135; Erik van Ree, op. cit., pp. 36 - 37.

④ “The Commanding General, United States Military Mission in the Soviet Union (Deane),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Moscow, October 17, 1944, FRUS, ibid., pp. 371 - 372; Herbert Feis, op. cit., pp. 464 - 465; Erik van Ree, op. cit., p. 37.

示苏军要占领朝鲜半岛北部港口表现出苏联一定要实现在远东确保不冻港的夙愿。而希望美国将作战范围限定在东海则可理解为以东海为界线划分美苏在远东地区的势力范围,互相承认美国对日本的支配权和苏联在朝鲜半岛的支配权。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将会使其对朝鲜半岛的一部分乃至全部实施占领的可能性大为增加。

(三)雅尔塔会议

德黑兰会谈结束后的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苏联的雅尔塔重新聚集。在此次会谈上,罗斯福重新确认了斯大林对朝鲜半岛托管方案的支持,而斯大林提问是否在朝鲜半岛留驻外国军队,罗斯福表示否定。两人达成共识,要让英国加入对朝鲜半岛的托管。^①两人虽对朝鲜半岛问题交换了意见,但并没有讨论具体的问题。罗斯福认为对日作战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且对美苏关系充满信心。当时,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分析即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要打败日本,在德国战败之后至少还需要18个月的时间。因此,罗斯福认为还有充足的时间与斯大林进行详细的协商。

罗斯福确信战时与苏联的协作关系在战后将继续得以维持,自信比谁都能驾驭斯大林。从在会谈中排除国务院的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上述态度。^②当时,国务院主张在对苏关系中采取充分利用经济实力和军事力的强硬政策,这与罗斯福的立场发生正面冲突。因此,除雅尔塔会议之外,美国国务卿几乎未能参加

^①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 770.

^② U. S. Congress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oviet Diplomacy and Negotiating Behavior: Emerging New Context for U. S. Diplomacy, Special Studies Series on Foreign Affairs, vol. I, 96th Congress, 1st Session, House Document No. 96-238,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in Library of Congress, 1979, pp. 174-175; pp. 60, 75-79, 83-84, 102-103, 120.